

楚汉人物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
第七届年会论文——《史记论丛》第四集

主 编 安平秋 赵生群 张 强
策 划 张大可 邓瑞全 陈 曦

史记论丛



甘肃人民出版社

楚汉人物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
第七届年会论文——《史记论丛》第四集

史记论丛

主 编 安平秋
策 划 张大可
赵生群
邓瑞全
陈 曦
张 强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论丛. 第4集/安平秋等主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226 - 03646 - 4

I. 史… II. 安… III. 史记—学术会议—文集 IV. K204. 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3830 号

责任编辑: 朱满良

装帧设计: 蒲亨军

史记论丛 (第四集)

安平秋 赵生群 张 强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插页 1 字数 525 千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978 - 7 - 226 - 03646 - 4 定价: 48.00 元

题 记

本集为《史记论丛》第四集，收入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七届年会的学术交流论文（包括了第六届年会作者提供了电子文件的论文）。共收入论文 59 篇，分为七组：第一组《史记校释与方法研究》，收文 11 篇；第二组《司马迁思想研究》，收文 9 篇；第三组《史事评析》，收文 9 篇；第四组《文学研究》，收文 10 篇；第五组《汲黯研究》，特辟的专人研究栏目，收文 8 篇；第六组《人物评传》，收文 6 篇；第七组《史记散论》，收文 5 篇，学术通讯 1 篇，总 59 篇，凡 52 万余言。因篇幅限制及种种原因，有 4 篇文章未收入，有一人两文，先收一文，有论题重复，选收一人，有文长而不便节选者，暂不收；未向秘书处发电子文件者，亦暂未收。未入本集的论文，作者付出的辛劳，深表感谢。作者可以做出相应调整，将在后续的论文集中收入。

本集所收论文，质量高于以往，尤其是文本清样的校对，较为精善，特别是中老年学者提供的文本最为精善，这种责任精神是值得青年学者学习的。我们希望，今后广大会员学者提供的论文更上一层楼。

本集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支持，中国史记研究会借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委会
2008 年 7 月

目 录

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七届年会论文

一、史记校释与方法研究	(1)
《史记》版本校勘史述论	安平秋 张兴吉 (1)
《史记》校点本标点问题举隅	王华宝 (13)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对《国语·越语》 的取舍和补充	龚剑锋 程光军 (20)
《史记》所载川商史料价值刍议	李纯蛟 (34)
黄震对《史记》的研究	史明文 (39)
楚汉逸史十则简说	曾志雄 (47)
汤始居之“亳”即“蒙”考证	王增文 (61)
东瓯考	杨 昶 (68)
司马迁之死探隐	刘洪生 (74)
《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研究方法评议	袁传璋 (80)

考证史实岂能主观臆断	金绪道 刘贤忠 (98)
------------------	--------------

二、司马迁思想研究 (104)

司马迁写社会变革	王记录 (104)
司马迁与汉初黄老思想的关系	高祯雯 (112)
司马迁的“货殖”思想	周良平 (122)
司马迁对萧何的褒扬与贬抑	李伟泰 (131)
司马迁笔下的叔孙通与陆贾	刘锦源 (142)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卫青、霍去病	宋怡达 (147)
司马迁文学思想浅析	高一农 (153)
司马迁的教育思想	王遂社 (159)
司马迁的饮食文化思想	丁 晶 徐兴海 (170)

三、史事评析 (181)

《史记·五帝本纪》的三大价值	陈桐生 (181)
汤大旱“翳发断爪”之巫诅解读	陈惠玲 (191)
《史记》民族精神论	马宝记 (200)
论春申君的功过及其成败之因	吕锡生 (207)
从历史的反面品评范增	李培培 (214)
略探韩信的人格特质	刘德汉 (221)
浅析汉初功臣名将归汉之因	赵红梅 (229)
刘邦与高起、王陵对话的探讨	林聪舜 (236)
由《史记》看史官的秉笔直录与载笔曲隐	陈海丽 (243)

四、文学研究 (253)

“发愤著书”说在汉魏六朝的接受及演变	陈 莹 (253)
--------------------------	-----------

尚奇与悲美——解读司马迁的屈骚情怀	苏慧霜 (264)
吴见思《史记》叙事学成就管窥	张富春 (280)
试论《史记》的精神美	康清莲 (289)
谈《史记》的对比特点	王麦巧 (297)
史记的比喻修辞	梁建邦 (305)
《史记》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描写的	
深层心理阐释	王晓红 (314)
漂母形象与漂母意象	顾建国 (322)
从性格上看韩信的悲剧原因	陈苗苗 (334)
《史记·游侠列传》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	贺 君 (338)
五、汲黯研究	(349)
汲黯评传	张大可 (349)
汲黯探微	陈 曦 (362)
汲黯的人格魅力	杨燕起 (371)
《汲黯列传》注	田志勇 (384)
《汲黯列传》语译	许 敏 (392)
《汲黯列传》读后	张 莉 (397)
《汲黯列传》集评	刘春梅 (404)
汲黯年谱	邓瑞全 (409)
六、人物评传	(413)
一代枭雄彭越	孙海洋 (413)
钟离昧评传	孟祥静 (419)
黥布评传	高 妍 (425)
樊哙评传	张 丽 (428)

灌婴评传	刘建立 (434)
刘敬评传	李 黎 (438)
七、史记散论	(449)
受宫刑后写作《史记》对司马迁的	
自我治疗	黄颖哲 梁建邦 (449)
读《汉将李陵论》札记	赵永建 (456)
《史》《汉》所载的汉代公主婚姻	唐 群 (464)
西府与无锡的不解之缘	刘宏伟 (472)
《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张新科 (477)
八、学术通讯	(495)
《史记》研究如何拓展?	刘振东 (495)

· 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七届年会论文 ·

一、史记校释与方法研究

《史记》版本校勘史述论

* 本文作者安平秋、张兴吉。安平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兴吉，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史记》自问世以来，在两千多年的流传中，难免会有一些错乱、缺失，历代学者都致力于《史记》旧貌的探寻工作，这些工作中对《史记》版本的校勘，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因而其历史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历代对《史记》的校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史记》古本资料，并清楚地反映《史记》成为今本《史记》的轨迹；同时，这些校勘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古代学者对《史记》的关注以及古代校勘学的理论与实践。大而言之，其校勘活动，或可以称之为“《史记》校勘史”。对这些成果的总结，即对《史记》校勘史的研究，也会从以上两个方面推动《史记》研究和《史记》版本研究以及古代校勘学的研究。基于此点，也鉴于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作为“《史记》校勘史”角度来研究的专题讨论，故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意在引起学界的关注，得到各方的指正。

关于校勘的概念，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笔者在本文中采用赵仲邑先生的说法，即采用他所说的“狭义的校勘”概念。他说：“专指同

一部书，用不同的版本和有关资料，互相核对，比较其文字错误；或只比较其文字的异同。”^①使用上述的观点，本文中的“《史记》校勘史”的概念，只要指历代从事《史记》研究的学者对《史记》正文以及三家注的校勘成果、著作，并主要着力于探究其校勘形式中使用《史记》版本的情况的分析。在本文中试着将“史记校勘史”分为四个阶段，即“写本时期”、“刻本时期”、从刻本时期分离出来的“校勘记”时期以及近代以来的校勘成果四个阶段。

一、写本时代的《史记》校勘

《史记》在问世后，很长时间是不为当时的学界所关注的。所以研究《史记》的著作出现的比较晚。陈直先生指出：“太史公自序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可证存于天禄石渠者为副本，与正本不知去向有无异同，正本疑即杨恽所宣布之本，西汉学者所读者为副本。太史公手书之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但所以不绝者，当时已副中录副。西汉王朝，虽恶其书，亦甚重其书，藏之密而守之慎。东平王求读副本而不可读，能读者，官吏如桑弘羊、王凤，校书如扬雄、刘向父子、博士褚少孙、桓宽、冯商等十余人而已。到了东汉初年，尚未半公开式，王允指为谤书，可见当时对《史记》之评价，纵有研习者，书名排列在《汉书》之后，今日称班、马，不称为马、班，仍沿着两千年相传之习俗语。”^②《史记》的流转中，很早就有缺失，西汉时期，就有人补《史记》之阙，即褚少孙的补写，如此的补阙，当然不是校勘的范围，不过，从中可见，人们对《史记》的关注有所提高。

《史记》的校勘工作，是伴随着《史记》的注释之学的出现而出现的。据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说：最早的《史记》注解之作是东汉时的延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不记作者的著作《章隐》五卷^③。两书久已亡佚，其对《史记》的校勘情况难以明了，但从其《音

① 赵仲邑：《校勘史略》“绪论”第1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② 陈直：《史记新证》自序第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笔者案：黄善夫本、彭寅翁本、《史记评林》本皆作“音隐”，似为正。今本作“章隐”，系来自于单行本《史记索隐》。

义》、《音隐》的书名，似乎可以推知其中有文字校勘的成分^①。

此后，《史记》的注释之作不断出现，如南北朝宋徐广作《音义》十三卷；裴驷说：徐广注“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司马贞说徐广的著作“唯记诸家本异同，于义少有解释”。可见其对文字的校勘颇有功力。朱东润先生在《史记考索》中有专文《〈史记〉徐广本异文考证》，对徐广的校勘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盖校勘《史记》之作，兴于此矣”^②。可谓持平之论。关于徐广的校勘成果，近来学者多有探究。杨海铮著作《汉唐史记研究论稿》、应三玉博士论文《史记三家注研究》中有细致的说明^③。张玉春也有专文研究徐广的《史记》校勘问题。本文就不多加叙述。

在今日传本的《史记》三家注中，还保存着唐以前《史记》的诸家注释，如南齐邹诞生撰《史记音义》三卷，其中也有校勘的成果。《史记索隐》中引用邹本所列文字异同者不多，只有九处^④。不过，据水泽先生的研究，邹诞生注中文字异同的数量要多许多。他认为有23条^⑤。池田英雄先生说：“水泽氏又从稀见之古板本中辑拾佚失古注，著以下三编：《邹诞生〈史记音〉佚文拾遗》（拾录约180条）、《刘伯庄〈史记音义〉佚文拾遗》（拾录约190条）、《陆善经〈史记注〉佚文拾遗》（拾录约100余条）。”^⑥

六朝写本不仅与今本文字间多有差异，而且各本之间也有异文，所以唐人在作《史记》注的同时，也对《史记》本文多有一定的校勘工作。刘伯庄作《史记音义》二十卷，此本虽不传，但有一部分还保持在后来的注释中。对此朱东润先生将散布在《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中的刘注，加以辑录，写成《刘伯庄〈史记音义〉辑佚》一文，对使用者提供了便利^⑦；同时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在日人批注中还找到了

① 笔者案：此后注音义者，多有校勘之功，故推论之。

② 朱东润：《史记考索》第10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杨海铮：《汉唐史记研究论稿》第114～117页，齐鲁书社2003年版。

④ 应三玉：《史记三家注研究》第18页。2004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⑤ 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第8册第236页。当然，其中一部分是“佚文”，即来自于日藏《史记》版本中的日人批注。

⑥ 池田英雄：《史记学50年》第48页。日本明德出版社1995年版。

⑦ 朱东润：《史记考索》第211～23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8 条刘伯庄的注文，其中有关文字异同者有 30 条^①。

从写本时代的情况来看，对《史记》的校勘著作都是单独成书，并流传于世的。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散失了，仅保留在其他的著作中。这中间，只有裴驥《史记集解》也许是因为与《史记》本文合并，几乎整部著作流传到了今日。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规律，即单行的《史记》校勘著作，以其内容的晦涩，使用人数受限等原因，似乎难以传世，时至今日，似乎也难以改变这种情况。目前，学界对这些成果都有一些关注，但还是缺乏更加全面的研究。

二、刻本时代的《史记》校勘

诚如上述，比较写本时代的《史记》校勘，刻本时代的校勘成果不是反映在专门的著作中，而是反映在具体的《史记》版本中。其校勘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史记》文字及注释的具体校改；二是校改中偶尔出现的校记。虽然后者在明代之前这个情况极少出现。考察此时期的《史记》校勘情况，比较简单的是从一些《史记》版本的序跋中了解这些版本总的校勘情况，其外的方法就只能是研究通过自己的校勘，来发现这些版本的校勘情况。

学界目前的研究认为，《史记》的最初刊行，始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 年）。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史记》刻本，但这个本子没有流传到今天，已经亡佚。因此，其具体的校勘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此本的校勘成果对后世《史记》版本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从此《史记》的版本校勘内容，可以说就是针对此本的校勘。

目前存世最早的《史记》版本是北宋仁宗景祐年间的景祐本。此本对《史记》正文及《集解》的校勘情况，因为保存在版本校勘中，因而指出其特点有一定的难度，据笔者的校勘，北图所藏这一景祐本，其正文与今本相校有些不同之处，如：《项羽本纪》中，今本有“项梁尝有栎阳逮”（一、296 页^②），景祐本在“逮”字下多“捕”字；“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一、307），景祐本在“诸侯”

① 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第 8 册第 244 页。以上情况可参见《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末所附三人的“佚文拾遗”。

② 笔者按：括号中大写数字为中华本册数，阿拉伯数字为页码。下同。

下多一“兵”。等等，这些皆可与今本互勘^①。张玉春也说：“此本早于诸本，且是奉敕校正，可谓善本。以此本与后世诸本相校，既可正它本之误，亦可依其文字承继探究宋本《史记》的版本系统”。他又列举此本《高祖本纪》、《吕后本纪》中22条例子，证明此本“多可正后世本之误”^②。从多方面的研究来看，景祐本此二处的异文，较今本及其他版本的文义更加通顺，可以认为是正解。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这是景祐本的校勘成果。景祐本所具有的版本价值，值得我们的注意，这个问题还应进一步探讨下去。

在景祐本之后出现的是《史记》十四行小字《史记集解》单刻本。以上是北宋本。南宋《史记》版本众多，计有《史记集解》单刻本的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淮南路转运司刊本、绍兴十年（1140）邵武朱中奉本；《史记集解索隐》本的南宋绍兴杭州刻本、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刻本、淳熙三年（1176）张杆桐川郡斋本、淳熙八年（1181）澄江耿秉重修桐川郡斋本。

以上七个本子，今传世本中多半无序文，故不经过各本间细致的对勘，就不能洞悉其校勘情况。这其中最后的两个本子有序保留，从中可以窥见一些情况。张杆有序文曰：“一日与友人沈伯永语及前代史，则以为先秦古书以来，未有若太史公之奇杰。班孟坚已不逮，而况其余乎。因搜笥中书，蜀中所刊小字者偶随来，遂令中字刊之，用功凡七十辈越，肇始四月望，迄六月终告成，伯永请予序，予谓太史公书安敢序，当书岁月、识目录后可也。然其间删削是正者，不可不书，旧注谓十篇有录无书，后褚少孙补之，其文猥妄不经，芜秽至不可读，每翻阅至此，辄败人意，不知何人遽续而传之，凡少孙所书者，今皆删阙之，然其间亦有可喜，如日者传，则大类庄周书，意其皆本书之残缺者。少孙因以附益，今则以注字别之，或可见其遗意。……或谓太史公取《尚书》语辄更定以为非是。予谓不然，书虽经孔子所定，然其文皆史官所记，故唐虞三代之书，语皆不类，则非一人之可知矣。一代之事，

① 参见安平秋：《史记版本述要》，《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笔者查《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发现水泽先生之记载了上述两条中的第1条，第2条不言景祐本有，而引用了梁玉绳《史记志疑》的研究；后者引用《汉书》，认为应当有“兵”字为宜。查龙良栋先生《景祐本史记校勘记》，无此两条，也是后者的疏忽所至。

②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127～1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必有一代之史。安可必有同哉。太史公迈往之气，渡越前古，意欲自成一家，故取书所载训释其义，而定以今言。若悉如书之语，则曰不类。故特裁正而不辞，盖更易旧史官之书，非遽变孔氏之书也。”从中也可见张杆对旧本不仅有删节，也有校改的情况，校勘上也有一定的价值。

耿秉本有跋文云：“淳熙丙申，郡守张介仲刊太史公书於郡斋，凡褚少孙所续悉削去，以尊正史也，学者谓非全书，怀不满意，且病其讹舛，越二年，赵山甫收郡，取所削别刊为一帙，示不敢专，二观者复以卷第不相入览，究非便置而弗印，殆成弃物。信乎。流俗染人之深，夺而正之，如是弃难，然星之於月，其不侔亦昭昭矣。屏之使不得并，孰若附之其旁，则大小较然，不意愈尊乎。别以所续从其卷第而附入之，两存其版，俾学者自择焉。其讹谬重脱，因为是正，凡一千九百九字，以辛丑仲秋望日毕工，澄江耿秉直之谨书。”可见此本不仅力求回复旧本的原貌，而且也有版本的校勘。

《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本的南宋庆元二年（1196）建安黄善夫本。另外，在南宋景定二年（1261），即蒙古中统二年又有《史记集解索隐》平阳道段子成刻本。中统本前有“董浦序”，其中也提及了刊行时有校改的情况。

元刻《史记》彭寅翁本刊行后，《史记》的刊刻出现了一个低潮时期，彭本刊行于公元1288年，此后在1306年（元大德10年）有饶州路儒学刻本。在此后国内处于动荡的时局，文化事业恢复得比较慢。大约200年后，一直到明代天顺年间才有人再次刊行《史记》。此本首行《史记索隐序》下括号内，题“豐城遊明大昇校正新增”；当然此时的《史记》校勘已经不仅仅是对《史记》本文的校勘，也包括了对《史记》注释的校勘。

以上的版本中有些没有序文和跋，从而我们一时间无从得知其刊行中的校勘情况，但应当说它们对《史记》都有校勘的工作，只是其成果散布在版本中，查找不宜。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具体的校勘工作的痕迹，以及其采用底本的情况。黄善夫本、彭寅翁本对以《老子伯夷列传第一》的问题，并有一个说明，很有意思，其文曰：“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这里的“監本”显然是指宋代的《史记》监本。又卷四史文“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天命，革殷，受天明命’（一、126）”。“膺更”字下黄善夫本、彭寅翁

本有注曰：“监本作受”，指“更”字当为“受”字。卷五史文“二老曰：‘臣非敢沮君军，军行，臣子与往……’”（一、191）。“臣”字下黄本、彭本有注曰“监本作吾”。此处的监本，当然是北宋、或南宋时期的监本，虽然我们还不可以据此就认为，黄本、彭本这些《史记》版本，一定用过宋监本进行过校勘，但至少可以说明，监本的成果为这些版本所继承。因为此二条校记有着比较明确的版本依据，较之以前《史记》版本注释中的“一本作”的提法，有了很大的进步，笔者认为：似乎此二条校记可以看做是《史记》版本校勘的最早校记。

可见，此时的两本是用宋监本进行校勘，或者至少两本的祖本用过宋监本做过校勘。虽然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直接引用监本的实例，但我们依然可以认为这是黄善夫本的底本中所拥有的校勘成果。而黄本、彭本的这三条说明，可以认为是承袭着徐广注之后的具有校记意义的发明。在《史记》校勘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这三条最早出现在黄本、彭本以前哪个版本中，将是进一步梳理《史记》版本以及进一步了解《史记》校勘史的关键。

明代《史记》版本众多，如有著名的“嘉靖三刻”和官刻本的四种南、北国子监刻本。从这些版本的序文中，都有校勘的影子。廖凯本有序云：“乙亥秋，随侍家伯出镇关西，遂谋於梓。用畅夙怀，然其所有，则《纪》、《表》、《世家》、《传》，而《八书》逸焉。间虽补之缙绅所藏，则讹文已甚，脱简弥滋，於是殚心穷思，日就月将，参眊群册，段以至理，颇若苟完斯典，不坠前闻。”明代王延喆本有跋云：“延喆不敏，尝闻于先文恪公曰：《国语》、《左传》，经之翼也；迁史、班书，史之良也。今吴中刻《左传》，郢中刻《国语》，闽中刻《汉书》，而《史记》尚未刊行。延喆因取旧藏宋刊《史记》，重加校讎，翻刻于家塾，与三书并行于世。”至于明后期的著名版本《史记评林》，虽然学界对其批评者居多，但此本的校勘上是有贡献的，据笔者的初步调查，此本在校勘中，使用了宋本以及明监本（余有丁）版本。

综上所述，以上《史记》各版本在刊行中，皆有比对旧版进行校勘的活动，其校勘成果当然值得我们的注意，只是这些成果散布在《史记》各版本中，进行全面整理的工作极为困难，造成目前学界还没有对这些成果进行全面的梳理，因而其成果的实在情况还不是很清晰，这些都阻碍着《史记》版本校勘的进一步发展。

三、《史记》的校勘记

刻本时代的《史记》中出现了大量的校勘成果，笔者认为，这些成果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学术著作中杂有《史记》的校勘的成果；第二种是学术著作中专文的《史记》校勘成果；第三种是版本中所附校勘记；第四种是专书的校勘记。

第一种的情况出现较早，在宋代，伴随着《史记》版本的刊行，对《史记》的校勘，已经开始。最有名的著作就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此种情况也是很多，近时有史明文《宋代校勘〈史记〉初探》一文^①，介绍的比较详细，这里就不多加说明。

第二种情况，清代是考据学发达的时期，对《史记》的校勘，有突出的贡献。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古史拾遗》，梁玉绳《史记志疑》等著作，钱泰吉《甘泉山人稿》中有专文的论说。其中都有使用版本资料进行校勘的情况。此种情况已经为学界所熟知，故亦不做更多的解释。

第三种情况，具有比较明确意义的《史记》版本中校勘记，笔者认为最早出现在明刻《陈太史评阅史记》中，此本每卷末皆有《考证》，题“××考”。如“周本纪考”。其中引用“洞本、湖本”来校勘，湖本是指明刻《史记评林》；洞本则指明刻《史记》白鹿书洞本。此笔者所见最早对《史记》版本进行校勘，并有校勘记传世的著作。此本的校记虽然不完全是使用《史记》版本的校勘，但其开启风气之功，是值得注意的。以后《史记》版本校勘中，常使用此本，可见此本的校勘水平。

清代的武英殿本，也似乎是受《陈太史评阅史记》的影响，在每卷末设“考证”，主要针对版本文字的异同展开议论。清武英殿本是《史记》的一个重要版本，众所周知，底本是明刻北监本，因为明北监本所存在的缺失，此本有大量的补充，但此本却没有对其使用《史记》版本资料的进行说明，更没有说明补充本的名称。一般认为用来补充明刻北监本的不足的应当是明刻王延喆本。但据张元济先生的统计：“殿本《正义》全脱者尚有五十二条，不全者四十二条。馆臣既知《正义》

^① 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2期。

独赖王本之存，何以不悉数采录？殊不可解”^①。此本中的“考证”的主要作者是杭世骏，笔者对武英殿本《史记》中各卷末的“考证”以及杭世骏《史记考证》中使用的资料进行了调查，认为：此本的“考证”，对《史记》及三家注进行校勘时，主要使用先秦古籍以及后来学者的成果，也使用的《史记》版本资料，如卷7史文“项梁尝有栎阳逮捕（一、296）”，考证云：“诸本皆无捕字，惟北监本有之”。这个结论当然，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水泽利忠说：景佑本、蜀大字本、南监本也有“捕”字^②。不过，如此的校记在“考证”中是极少的，因而关于其使用《史记》版本资料的情况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张文虎在其《史记校勘札记》跋尾中说：“新刊史文及注，皆不主一本”，表明金陵书局本和武英殿本并无直接的联系，言语中显然对此官刻本有自己的看法。也可见其版本校勘方面的问题。

第四种情况，作为专书的《史记校勘记》的出现，可以看做是《史记》的校勘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校勘学在理论的梳理中，不自觉进入自觉的过程。作者认为，专书的出现，不仅有利于发现《史记》的错误，提示人们的注意，而且也为人们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对《史记》作进一步的校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也为人们总结校勘学的理论方法，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而这种专书出现在清代，这似乎和清代的考据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前代最有名的《史记》校勘著作，或者说校勘记，是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清同治六年（1866）金陵书局刊行《史记》，同治九年（1870）完成。张文虎参与《史记》的校勘工作，著成《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这是《史记》校勘的巅峰之作，就其使用的版本而言，达到17种之多，其中有5种宋本。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全面总结《史记》研究成果，形成了二部有名的《史记》研究著作，它们也是《史记》校勘的名著，即《博士家史记异字》、《史记考异》。编撰者是当时日本加贺藩^③的儒学者大岛赞

① 张元济：《校史随笔》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220页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笔者按：中华本无“捕”字。

③ 笔者案：加贺藩，日本江户时代大名前田氏的领地，在今日本石川县南部。以下资料引自水泽先生《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的相关记载。